

# 毛泽东对改造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张放

**[摘要]**毛泽东认为,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关系。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具体思考,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资源之间如何协调整合,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利完成所有制过渡,消除城乡、职业、分配等诸差异;第二,在建设进程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褪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不动摇;第三,如何践行人民民主,将处于压迫结构中的人解放出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0年代前后开始的社会关系领域改革,紧紧围绕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为今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关键词]**毛泽东;改造社会关系;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1)08-0079-14

在毛泽东看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改造社会关系。若要全面、整体理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就需要紧紧抓住社会关系改造这一主要线索。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思考,源于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和人民至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探讨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分享。毛泽东始终关注生产力发展,不过他认为生产力发展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关系结构。事实上,社会关系性质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生产力发展成果注定为资产阶级服务,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才能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作者:张放,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因此,必须不断改造社会关系,以确保生产力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减少发展阻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关怀。

##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关系改造的历史背景和价值关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毛泽东给出的答案简单明了,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sup>[1](p.1245)</sup>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实现之后,必须逐步建立起属于中国

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无产阶级先锋队应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sup>[2](p.1081)</sup>工业发展、技术进步是民族独立的基本保障,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就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中国任由列强欺负的原因即在于缺少新式工业。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只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sup>[3](p.146)</sup>在他看来,工业化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若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所建树,就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努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具备了将革命时期设想付诸现实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任务便是带领全国人民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奠定民族独立的根基,进而实现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建成工业化强国。

毛泽东心中的工业化强国,不仅要实现国家整体的强大,还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有效改善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状况,使人民精神面貌明显提升,主人翁意识逐渐增强。简言之,工业化应体现出“人民至上”。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首部宪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sup>[4](p.522)</sup>人民民主是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政治文明不同于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政治文明,而是“接脉于马克思主义,更根源于近现代以来的基本国情,不断形成和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之中,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sup>[5]</sup>人民民主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sup>[4](p.491)</sup>当内部关系改善,不再存在严密的等级结构和特殊利益集团时,广大人民就能够突破身份藩篱,积极参与建设,“共同利益”方能最大程度得到保障,“统一意志”才有实现的前提。

可以说,“人民至上”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至关重要的维度,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价值关怀。在马克思

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的幽灵所推动,而是由完全物质的实践活动所推动。这种完全物质的实践活动则是由生活在真实世界中、有基本生存需要的人所承担。从事生产实践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sup>[6](p.169)</sup>唯物史观完成了历史发展的祛魅化进程,将人的作用和力量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毛泽东秉承这一历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他在革命战争中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团结起来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sup>[7](p.139)</sup>在实现工业化这一新征程中,主体依旧是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不仅如此,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果也应为人民群众所分享。在毛泽东看来,这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初衷和要旨。

然而,新中国初期所面临的困境,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想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可以从以下四方面予以概括。

第一,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落后。194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其中重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4%,根本没有能力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等重型精密仪器。直到1952年,中国人均发电量仅12.6千瓦时,为同期苏联的1/44,美国的1/234;<sup>[8](p.29)</sup>钢年产量人均2.4公斤,而苏联则达到人均150公斤,差距巨大。<sup>[9](p.704)</sup>基础设施极为简陋,1949年全国能通车的公路仅有5.4万公里,没有全国性的邮电通讯网络,水利工程严重匮乏。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同抗战前最高年份比较,粮食产量下降24.5%,棉花产量下降47.7%。<sup>[10](pp.35-37)</sup>

第二,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状态。据统计,1949年全国总人口总计5.4亿,其中城镇人口仅5765万人,乡村人口达到4.8亿,占全部总人口数的89%。<sup>[11](p.6)</sup>城乡人口比重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对工业化发展造成重大羁绊。城乡之间的生活状况也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最早的统计数据看,1957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sup>[11](p.25)</sup>除城

乡差距外,地域之间发展状况也存在不平衡。以国民政府时期发展比较好的上海市和重庆市为例,1949年两地区的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0.28亿和13.89亿,相比之下,同一时期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地区的生产总值分别为6.23亿、8.93亿及1.29亿。<sup>[11](pp.362,804,872,906,940)</sup>生产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各种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配差异。

第三,产业所有制比例失调。解放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政府官僚资本膨胀的局面。当时,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70%的银行和80%的产业资本,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sup>[10](p.12)</sup>除官僚资本外,由国外资本控制的企业也不在少数。1949年国外资本在华企业有1000余家,绝大多数属于英美两国的垄断资本。<sup>[12](p.7)</sup>另外,还有不少企业归国内私营资本控制。以官僚资本、国外垄断资本和私营资本为主体的所有制现状,很难保障工人权利,剥削压榨现象严重,企业管理缺少民主化意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更无从谈起。

第四,人才培养供给不足。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水平整体薄弱,全国人口中80%以上均为文盲。根据国民党政府1947年统计,全国平均每万人中有高等学校学生3人,中等学校学生38人,小学生486人。接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如此之低,使得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学校级别越高,私立学校的比重就越大,教师在海外接受教育的比重越高,思想状况就越复杂。1949年,私立初等学校占比3%,私立中等学校占比27%,私立高等学校占比39%。<sup>[13](pp.184-185)</sup>私立学校一部分由国内私人资本控制,另外一部分由国外教会控制。这些学校讲授的内容不受政府管控,许多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价值观相违背;教师中间还存在恐美、崇美的心态,一些人对新中国的认同程度不高。<sup>[11](p.1485)</sup>

概言之,新中国初期的状况不仅是经济技术落后,而且在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管理机

制、教育状况等方面均存在诸多不足。1963年,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历程时,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若要真正摆脱弱国地位,就必须同时从这两方面入手对旧中国进行改造。<sup>[14](p.340)</sup>毛泽东致力于探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恰恰要同时从这两方面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使中国走向一条全新的工业化之路,需要配合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全新社会关系,这条新路才得以完整呈现。毛泽东通过一种唯物主义的整体现象来对待工业化,指出了工业化进程除了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经济提升之外,还应包括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内容,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改造社会制度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并非毫无干涉的两条平行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新中国之“新”的一体两面。通过这一唯物主义整体现象,能够更加深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始终关注社会关系领域改造的深层关怀。

## 二、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

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包括了对社会关系领域的改造。为早日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考的重点之一便是改造社会关系。毛泽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一)“社会关系”性质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

所谓社会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包括两部分,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毛泽东援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将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分配形式归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范畴,偏重物质和经济层面;<sup>①</sup>而上层建筑则偏重精神和政治、法律等层面,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关系。

<sup>①</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79、67页。

在毛泽东的分析视野中,物质和精神层面相互作用、影响,难以严格区分开来,用“社会关系”这一表述可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纳入其中。毛泽东认为从社会整体发展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旧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sup>[15](p.214)</sup>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上层建筑也与其存在一定冲突,例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对生产关系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进而羁绊生产力发展。<sup>[15](p.215)</sup>也就是说,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关系领域,由于存在诸多矛盾冲突,直接影响到生产力发展。唯有更好地调节各种对立冲突,理顺社会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理论表述。他认为必须对社会关系进行整体把握,既要考虑到生产关系,也要涉及上层建筑,不可有所偏废。苏联教科书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多强调物质问题,对上层建筑着墨不多;而忽略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无法理清,生产力发展方向难以确保。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重点讨论。

毛泽东通过研究各国革命历史,发现变革总是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首先制造舆论,然后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经由此消灭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继而为与新生产关系相匹配的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在他看来,动摇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发展的顺序乃是“一般规律”,通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毛泽东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规律。例如,毛泽东发现农村实行合作化前后使用的工具区别不大,

但是通过舆论为合作化造势,各地普遍推行合作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家一户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另外,他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同样得益于上层建筑的变化,即地方力量充分发挥了的首创精神、主动精神。<sup>①</sup>

根据一般规律,当上层建筑促成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就会推动生产力发展,以适应社会关系领域的变化,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然而,这种平衡并非绝对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sup>②</sup>把握这种不平衡性应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势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毛泽东从未动摇;但打破平衡、促成生产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变社会关系。

在明确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探索,必须置于社会关系的结构中进行,脱离这一结构,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就容易走向极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sup>③</sup>即将生产力转变为失去社会主义价值关怀的纯粹技术问题,以致可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这对致力于追求社会主义价值意义的毛泽东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在此,毛泽东道出了关注社会关系领域改造的根本原因,即通过改造确保生产力时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不至于出现价值偏离的结果。我们唯有将社会关系改造提到规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度来认知其重要性,才能够打破舆论界以及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各种“唯意志论”版本的基本逻辑,还原毛泽东对相关问题思考的全貌。

## (二)界定社会关系领域的矛盾性质

1956年底,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据绝对优势,社会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170、298、172、354页。

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422页。

③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422页。

主义公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社会关系领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是否意味着社会关系领域的改造已经完成,毛泽东认为并非如此。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的发展是以苏联为榜样,即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基础。<sup>[9](p.705)</sup>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也呈现出诸多不足,例如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缺少统筹,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依旧,对中小工业以及非生产性建设的重视不够,以及生产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加剧等。这些问题使毛泽东确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社会关系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矛盾,而当务之急乃是对社会关系领域的矛盾性质做出判断。

19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围绕界定、对待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问题展开思考。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开始以苏联建设经验为镜鉴,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讲话中所提到亟须处理的十种关系,都是社会关系领域的矛盾表现,“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sup>[15](p.44)</sup>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党中央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并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sup>[16](p.248)</sup>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表述,但因尚未有成熟思考,只是在小范围内将自己的看法与少数中央领导进行了交流。<sup>①</sup>

随后,在主持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对社会关系领域内矛盾的性质有了进一步思考。他将矛盾分成两类,一是敌我矛盾,二是人民内部矛盾。前

者体现为阶级利害冲突,是根本矛盾;后者是由正确和错误意见构成的矛盾,是非根本矛盾。不过在特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方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继而转化成敌我矛盾。<sup>[17](pp.562-563)</sup>毛泽东结合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开始明确将“阶级冲突”作为分析矛盾性质的主线索。通过阶级视角,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对判断矛盾性质、处理矛盾对立提出了更高要求。毛泽东的这一判断高屋建瓴,兼具理论性和政论性,力求“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sup>[18](p.611)</sup>

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延续了矛盾性质的二分法,认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将阶级分析进行了普遍化尝试。他指出阶级斗争和对抗性矛盾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中均有所体现,并非仅存在于敌我矛盾之中。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即在于通过适当方式,将人民内部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方面引导。在阅读教科书过程中,毛泽东坚持阶级分析,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领域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不能回避阶级斗争。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关系中依旧有脑力—体力劳动、城市—乡村、工人—农民等诸多差别,这些差别就是矛盾,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sup>②</sup>

### (三)改造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向

社会关系领域存在各种矛盾,社会主义发展理应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1959年末到1960年初,毛泽东结合新中国十年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改造社会主义关系进行了集中思考,指出了三个具体方向。

第一,工业和农业之间需要整合协调发展。

毛泽东在研究苏联发展模式时发现,其发

<sup>①</sup>参见吴冷西:《新的探索和整风反右》,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2页。

<sup>②</sup>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11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800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41页。

展过程中出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失调的现象。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轻工业品价格高,这种不平衡状况存在隐患。在他看来,重工业价格低可能是由于行政命令干预所导致,不符合发展本身规律,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工人不会发自内心地参与生产管理,最终使重工业难以赢利,需要依靠国家补贴。毛泽东的看法得到了相关数据支持,从1925年到1957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93倍,消费资料生产仅增长17.5倍,工人的生活状况改善未能与重工业发展同步,势必影响到积极性和士气。而轻工业品定价过高,则可能使产品市场无法迅速扩大,人们无力消费,影响资金积累,反过来影响重工业的发展。<sup>①</sup>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sup>②</sup>在毛泽东看来,要想真正找到解决重、轻工业失调的规律,就必须拓宽视野,局限于工业领域难以找到答案。他通过观察发现,辽宁省在着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忽视了农业发展,结果城市粮肉菜等基本物资的供应跟不上,只能依靠中央调拨。随着工业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相应减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城市对农业的要求却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反而成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因此,工业的持续发展,不仅在于解决重轻工业的比例,而且要和农业一并统筹规划,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平衡问题。

通过对实践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将解决比例失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概括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他专门对“并举”的含义做出解释,指出“并举”不意味“平均使用力量”,<sup>③</sup>因为每个阶段都有发展重点,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并举”的提法旨在提醒,工业和农业共同构成了持续发展的完整系统,必须有所兼顾,才能确

保系统的正常运转。这反映出一种资源整合思维。

毛泽东倡导工农业资源整合协调发展,有深刻的思想用意。他指出,当时中国存在两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存在根本差别。集体所有制下的产品和物资,归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不能对其进行支配。只有在全民所有制下,国家才能够充分调拨资源,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因此,如不克服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差异,生产关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在他看来,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工农的矛盾”,<sup>④</sup>农民和工人真正消除身份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两种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如此一来,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的劳动者,造成身份差异的所有制基础消失,劳动者生活状况普遍改善,城乡内部及城乡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化解,社会关系将得到质的提升。

第二,不能割裂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社会主义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不能离开政治。他对苏联模式一个比较大的意见在于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他批评教科书“在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教科书说个人物质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毛泽东认为这种说法将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犯了分配决定论的错误。教科书过于强调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sup>⑤</sup>这会给人一种消极暗示,即一切要以个人物质利益为中心,离开物质利益,一切免谈。

<sup>①</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86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560页。

<sup>②</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98页。

<sup>③</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70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678页。

<sup>④</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215—216页。

<sup>⑤</sup>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403、399、334页。

把物质利益绝对化的做法,在毛泽东看来势必会增加新老工人、强弱劳动力以及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如此生产关系“一定要出毛病”。教科书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强调首先关心集体事业,社会主义建设者就缺少精神状态,随即失去战斗性。毛泽东援引列宁的话对这种状况提出批判,“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sup>①</sup>

不能单纯依靠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因为物质刺激很难一直增加。特别是在困难时刻,“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因此要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位置,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依靠“技术加政治”两条腿走路。这里所谓“政治”,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教育,二是思想政治工作,二者都涉及精神作用。毛泽东强调精神作用,但不提倡过度精神奖励,因为过度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本质上一致,都会引导人们注重个人表现,忽略集体价值,助长个人主义不良习气。<sup>②</sup>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指出不重视精神问题,不讲政治,不改造人的思想,断无可能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重视精神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考虑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鲜明且坚定,他认为必须牢牢掌握舆论武器和文化教育阵地,确保宣传和教育内容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化,肃清资产阶级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唯有持续不断地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民众才能更加清醒地界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才会以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为重,不再拘泥于个人得失。<sup>③</sup>

第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指出,与所有制相比,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就很难再出现大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还可以发生持续性改变。<sup>④</sup>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得更加平等,是毛泽东思考的主要方向。他认为应该主要从劳动生产、分配以及教育等方面加以改变。

对于劳动生产,毛泽东做了较多思考。他指出,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必须经过争取和斗争才能建立。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行政等级制度森严,领导干部居高临下,脱离群众,滥用、寻租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对人民群众形成压迫,等等。这种不平等关系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应及早做出改变。领导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姿态深入一线参与劳动,打破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规章制度。在毛泽东看来,普通劳动者由于身处社会实践现场,对实际问题的把握更加准确,远胜于缺少一线经验的官员,各种实质性的创新突破也往往由这些人完成。身居高位者,唯有经历基层生活,才能真正融入民众,成为其中一分子,身份藩篱才有可能破除。

关于分配方式,毛泽东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工资制改革提出了相应反思。工资制是1953年开始针对根据地普遍推行的供给制做出的相应调整。不过严密的等级划分和相应的工资差异,却变相巩固了等级制,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毛泽东对此充满忧虑。他表示:“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sup>⑤</sup>不过,囿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分配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在当时公社具体实践中,一般采取工资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135、383页。

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428、442、448、427页。

③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227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685页。

④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19页。

⑤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68页。

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收入中供给部分的比例一般在30%到40%之间。<sup>[19](p.172)</sup>对于供给制,毛泽东更多是提出了希望和指出了变革方向——根据地时期的实践经验应受到充分重视。

教育改革也是毛泽东思考的重点之一。如果说前两方面的改革旨在当下,那么教育改革则意在未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作为文化资本形成、凝聚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在巩固统治阶级地位和维持其地位延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资产阶级精英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保证其后代在汲取知识进而转化成资本资源的过程中占尽优势。<sup>①</sup>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改革,皆意在克服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弊端,打破干部子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权,让工农子女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将其培养成兼具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sup>②</sup>

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关键特征。平等关系建立与否直接关乎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上下所呈现出的高昂状态,恰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得以改善的事实。保持这种朝气,就必须坚定地向建立平等关系这一目标前进,不能有丝毫妥协。

### 三、毛泽东改造社会关系的 实践探索

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既是以新中国建设经验为基础展开,也充分体现出他的价值关怀和社会主义信念,为今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毛泽东所聚焦的三个具体方向,反映出他在探索人民至上的社会关系时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意识:第一,如何协调整合各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利完成所有制过渡,消除城乡、职业、分配等诸差异;第二,如何在建设进程中,保持社会主义理

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不褪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不动摇;第三,如何践行人民民主,将处于压迫结构中的人解放出来,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围绕上述问题意识,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展开探索,有效塑造了新中国的社会关系,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性动力。

#### (一)贯彻整合思维,实现协调持续发展, 减小工农、城乡差异

农村如何摆脱传统帝制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模式,广大农民如何终结终日劳作却依旧困苦的状况,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重点问题。从合作化到集体化的农业发展之路,使其看到了农村摆脱传统发展命运的契机。<sup>[20]</sup>明确总体方向之后,如何实现农村持续性的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异,缩小工农之间职业、分配等差异,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便成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

毛泽东将整合协调思维应用于实践,指出农村要打破各种社会关系藩篱的突破点在于必须实现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单一发展模式将会限制农村的转型升级,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之后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也无处安放。上海周边的诸翟乡通过发展多种经营,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巩固了农业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趋势,指出农村的多种经营可以发展为以服务城乡为目的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sup>[21](p.756)</sup>1958年,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明了农村综合发展的方向——与工业相结合,认为地方工业与农业之间有更为直接密切的联系,其基本任务便是为农业服务,特别是县以下的工业主要应面向农村,配合本县农业生产,农村干部应该有意识地将办公社与办工厂结合起来;强调工厂所需劳动力主要应就地聘用,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sup>[22](pp.275-279)</sup>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地方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其发展;反过来,工业协助下的农业发展可以进一步解放劳动力,使其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实现良

①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法]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害》,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②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742页。



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身份转化也具备了可能。

1950年代末,毛泽东对实现工农融合互补的路径有了进一步探索。他不满足苏联集体农庄的策略,即鼓励农民副业收入,却不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似乎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在他看来,公社作为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组织,是尝试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工农并举的理想组织单位。“社办工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深刻探索。“社办工业”有助于缓解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现象,从长期看能够确保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接近一致,消除城乡差异。通过发展“社办工业”,每个公社都可以成为经济中心,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即可就地转化成工人。如有可能,还要在“社办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缩小与城市工人的差距。<sup>①</sup>

“社办工业”的设想提出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许多公社设立了专职负责工业的党委书记,甚至还建立了单独的工业管理机构。到1950年代末,中国乡村已经建成约70万个“社办工业”,创造产值70亿,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sup>[23](p.65)</sup>“社办工业”创办之初,首先是以工业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方式展开。从具体操作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厂社挂钩、分片包干、一包到底”。哈尔滨、兰州等地都采取了以厂包社的措施,工厂帮助公社生产机械农具。二是组织服务队、建立修配网,帮助人民公社检修机械和工具,传授技术。三是由工厂出人力帮助人民公社培养技术力量,洛阳、成都等地都采取这种方式,定期组织技术服务队到公社服务。四是帮助公社办工厂,支持“社办工业”,如成都的九个工厂企业帮助公社建立“社办工厂”37个。在其他一些地区,厂矿企业和当地公社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机制,通过人才输送、现场会议、先进经验推广队等多种方式帮助公社兴办工业,实现工农协调发展。<sup>[24](pp.172-174)</sup>经过整合,公社工业生产

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以成都为例,当时郊区公社可以生产机床、电动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各种机械,用工业生产成果振兴农业,在区域内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产量。<sup>②</sup>

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实现整合的构想,落脚点并不局限于农村发展。实际上,毛泽东是在探索以公社为基本单位的协调发展之路,以求尽可能整合资源,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快速实现。1960年3月9日,党中央发出在城市推进人民公社发展的指示,意味着协调发展理念开始从农村过渡到城市。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目标之一同样是推动“社办工业”,此举对“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巩固,对解放广大家庭妇女,把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跃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sup>[19](p.261)</sup>通过社办工业,城市闲散劳动力被有效组织起来。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劳动力的组织程度已经达到75%以上,向国营企业输送300多万人,向社办、街办工业、事业单位输送410多万人。<sup>[19](p.457)</sup>与农村类似,通过加入“社办工业”,一方面这些劳动力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并未被边缘化、被抛弃,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劳动,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一来,通过整合思维和协调发展理念,闲散劳动力就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巩固城市发展。中央报告指出此举措可以进一步消除城市中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发挥城市潜力,提升劳动者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有效改变社会关系,促进生产大发展,毛泽东深以为然。<sup>[25](p.57)</sup>

## (二)完善价值观教育机制,保持社会主义理想和信仰不褪色

毛泽东视野中的教育,不是知识灌输,也不局限于学校课堂,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树立,并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sup>③</sup>因此,教育涉及学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32、197页。

②参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资料选编》,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档案局2007年版,第587页。

③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300页。

校、媒体、出版等多个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实践,均与这一问题意识相关。

第一,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塑造密切相关的领域,为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从新中国成立初即已明确坚持公办党管原则。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之时,就非常重视对大中小学校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的管理工作。<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陆续接办了私立和国外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校。截至1956年,教育系统各级学校已经全部实现公办。学校公办后使用的教材由国家统一指定,设立严格审查制度,对教材内容进行把关,将不符合主导价值观念的内容进行调整。媒体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一方面接管私营媒体,严格管理国外媒体,另一方面,为减少信息错乱而造成谣言传播和人心不安,要求全国重要新闻须统一发布,地方媒体不得随意发表。<sup>②</sup>中宣部也进行重组,新机构包括政治教育处和时事宣传处,前者掌管党内外思想斗争与教育的问题,后者对媒体宣传报道进行监督指导。<sup>[26](p.11)</sup>经过系列整顿,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由党统一领导,为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全面思想改造。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从业者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许多从业者有留洋经历或者在国内接受西式教育,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颇深。思想改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摆脱资产阶级文化和教育的循环生产,打破文化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传统,探索社会主义路径实现的可能,让受教育者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而改造世界。从1950年代初起,各级知识分子都参与到思想改造中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党中央特别强调不仅高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改造,从事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同样需要改造。思想改造分

为两种形式,一是日常自学,二是集中讲授学习。内容方面,高级知识分子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著作为主,以期从整体上改造其世界观;中小学教师以学习社会发展史为主,旨在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劳动观念。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小学教师也开始增加学习内容,像批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这类传统上被认为由高级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也都出现了中小学教师的身影。除此之外,党中央还专门为媒体从业者举办新闻训练班和新闻学校,为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史以及国际政治与时事等课程。<sup>③</sup>

第三,将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1960年陆定一在《教学必须改革》中指出,“教育和教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决实行”。<sup>④</sup>这一号召得到各地响应。浙江省有90多个中专以上学校的三万多师生到工厂和公社参加生产劳动,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同工人一起完成技术革新一万余项,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有四百余项。通过生产实践,师生将书本知识和实际应用相融合,激发了研究的积极性。<sup>[19](pp.266-267)</sup>清华大学的学生通过参与工具制造,对经常困扰他们的抽象理论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把握;一些对专业学习有排斥情绪的学生,通过参与专业相关的生产实践,亲身体会到了从事专业的价值意义,提升了动力,亲身体会到学习为谁服务的道理。<sup>[27](p.974)</sup>中小学则主要通过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参加劳动来实现结合。如北京市规定高中生每年应有三个月的时间从事劳动,初中和小学则可适当较少劳动时间。<sup>[28](p.669)</sup>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是进一步探索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开拓社会主义教育模式的尝试。与生产实践和社会现实相对脱离的传统教育模式,很难从根本上打破资产阶级教育的垄断地位。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打破这种垄断的关键突破口,也是保持社会主义

①参见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8页。

②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来电》(1955年4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585-1;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④转引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72页。

理想和信仰不褪色的重要机制。

第四,树立英雄模范,展开榜样教育。榜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传统。毛泽东时代影响范围最大、影响程度最深的英雄模范,无疑是雷锋。1963年3月,毛泽东应《中国青年》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纷纷题词,将雷锋精神概括为“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等。<sup>[29](pp.188-189)</sup>随着毛泽东等人题词的发表,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运动在全国开展。各地各行业通过报告、讨论、板报、展览、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雷锋事迹。在学习过程中,雷锋精神被进一步明确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和祖国服务,严于律己、刻苦钻研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各地还尝试探讨如何将运动式学习转化为日常式学习。例如,北京将学习雷锋纳入学校的长期教育计划,并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特点,将雷锋精神具体化;<sup>[30](p.218)</sup>上海则特别强调将学习雷锋与工作中的具体事务和目标相结合,例如在工厂结合“五反”运动,在知识青年中结合劳动教育工作等。<sup>①</sup>雷锋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其言行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生动诠释。雷锋精神通过广泛的学习运动深入人心,成为几代人的精神榜样和行为参照准则。

第五,建立干部政治学习培训制度。党的干部信念理想不动摇,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至关重要。将党的干部政治学习常规化、制度化,与日常工作相融合,是这一时期思想教育的重要举措。干部政治学习一般由地方党校负责。以上海为例,1950年代党校开展的政治学习项目包括干部训练班、工人政治学校等,其中干部政治训练是重点。据笔者统计,从

1949年到1965年,上海市委党校共举办干部政治培训班39期,受训学员累计18847人。<sup>②</sup>学习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哲学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中共党史、政治常识、党建常识等方面,各地在这些基本内容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增加一些理论联系实践的板块。<sup>③</sup>这种干部培训机制,有助于学员将政治学习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理解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如何体现在实践当中,进而在日常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

### (三)探索人民民主,破除等级结构

首先,坚决反对、打击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使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各种繁冗的程序、文件不仅阻碍了领导干部与群众深入互动的可能性,而且也使群众逐渐失去对领导干部、对地方基层政权的信任和依靠。官僚主义在构筑等级结构、割裂干部与群众沟通方面危害甚大,毛泽东在对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的修改时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sup>[25](p.109)</sup>1960年3月30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明官僚主义呈现出“五多五少”之态势,即召开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留守机关多,实地调查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踏实细致工作少。指示表明,任凭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危害极大,“务必彻底地整顿”。<sup>[25](p.114)</sup>

指示发出之后,各地旋即开始探索尝试。例如,河北省吴桥县推出了“二五制”领导方法,一周之内,周一周二为县委、公社党委、管理区总支开会、研究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周三至周日要求到一线深入工作、参加生产。在深入一线过程中,干部需要完成四项任务,即培养基层干部,发现榜样模版、做好经验推广,参加劳动生产,对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及时反映群众要求。通过“二五制”,吴桥县有70%以上

<sup>①</sup>参见中国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的情况报告》(1963年6月12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950-16。

<sup>②</sup>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志》编辑部编:《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志·大事记(1949—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页。

<sup>③</sup>参见本书编写组编:《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校史(1951—2011)》,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0页。

的干部都深入一线生产,和群众交流明显增多,完善了沟通机制,深入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后进赶先进,基层干部的动力得以提升,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也获得改进。<sup>[19](pp.64-67)</sup>四川省委也在农村建立了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制度,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遏制,其具体措施包括:对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三级组织的干部实行轮调,让干部熟悉不同层次的工作,相互监督,并力图发现能力出色、政治过硬的基层干部;县委机关每年至少有8个月下乡流动办公,接触群众和实际工作;地县两级须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三级组织的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等内容,一年至少两次;干部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各级干部需要参加劳动,每年县以上干部至少一个月,区级干部不少于四个月,公社干部不少于六个月,管理区干部不少于八个月,生产队干部全年80%的时间则须从事生产劳动;所有干部须严肃革命法纪,严禁铺张浪费,不得存在违法乱纪以及公款请客送礼等行为。<sup>[19](pp.483-487)</sup>另外,为进一步敦促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生活水平接近,党中央于1960年10月发布指示,要求整顿特需商品供应市场,制止干部生活特殊化现象。<sup>[31](pp.265-268)</sup>

其次,打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身份界限,调动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主人翁精神。在改革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旨在凸显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打破干部、工人和专家之间的身份壁垒,纠偏技术挂帅路线。<sup>[32]</sup>这一总体方针推广之后,各地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完善,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第一,工人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增强,精打细算,控制生产成本。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后,责任感明显提升,将工厂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严格把控监督成本核算,防止不必要的浪费。例如,较之1959年,黑龙江庆华工具厂

1960年1月份的成本降低1.52%,2月份降低4.27%,3月份降低6.13%,4月份降低7.9%,5月份降低17.49%。之所以能够实现成本降低,乃是因为该厂将生产小组经济核算与定额化成本核算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实行日检查、周分析、月总结,使核算、分析和监督相结合,挖掘成本变化的内在原因。这套核算制度与生产比赛相结合,促进人人关心经济效果、核算过程分毫不让的新风尚。<sup>[31](pp.183,195)</sup>

第二,工人的管理能力得到加强。庆华工具厂经过两年多的管理实践,通过“师徒一职制”“一职多员制”等措施,促使95%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小组管理工作。工人管理员队伍在不断扩大。在1960年进行的管理工作测验中,已有50%的工人管理员达到同等业务员的水准,有20%的工人管理员可以胜任车间职能组长和主任的工作,工人在编制劳动计划、成本计划和生产作业计划方面的能力显著提升。<sup>[31](p.196)</sup>

第三,工人的创造性得以激发,积极加入技术创新进程。1960年初,党中央转发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批示,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开展相关规划。在这场技术革新运动中,工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食堂职工,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利用车间生产废料进行设计制造,在一年的时间内实现洗菜、切菜、切肉、和面、淘米、洗碗等炊事用具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吉林化工公司充分调动员工参与科学研究,“技术研究成风,科学研究成网”,有5000员工组成了500个科技研究小组,从事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sup>[24](pp.47,95,203)</sup>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工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提振,“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全民性的群众运动”。<sup>[25](p.79)</sup>

除上述两方面外,尝试实现人人平等的另一方向集中在教育领域。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方面,改革要让更多普通民众加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制改革,将教育体系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体制教育系统,二是为

在职工农准备的业余教育系统。这两大系统在新的学制体系中地位相同,只要学生能力达到相应水准,均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新学制设计意在凸显工农业余教育体系的地位,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sup>[27](p.105)</sup>

1950年代的教育实践从体制教育和业余教育两方面同时入手。体制教育改革从小学“四二”制改革开始,这套学制源于美国,沿袭于国民党时期的教育实践。四年制的初级小学和二年制的高级小学在城乡之间分布严重不平衡,后者数量远远少于前者,这就使广大劳动子女在初级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高级小学,更遑论进一步接受教育。<sup>[33]</sup>教育部旨在打破初小和高小的界限,实行一贯制,并缩短学制,在此基础上增加小学和中学的数量,保障更多适龄学生不仅能够入学,还能够接受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基础教育在校人数明显提升,相应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也大幅增加。根据1962年教育部做出的统计,1952年至1961年间,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从5110万增至7654万,初中人数从223万增至680万,高中人数从26万增至138万,高校人数从19.1万增至94.7万。<sup>[27](p.1099)</sup>

业余教育在1950年代末也迎来了大发展。与体制教育相比,业余教育涉及的人数更多,年龄范围更广,受教育者多是普通劳动者,加速业余教育发展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理想而言至关重要。考虑到广大受教育者的实际文化程度,这一阶段业余教育的工作重心放在扫盲。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间,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9000万人左右,1957年之前扫除人数在2400万人,1958年开始加大扫盲力度,平均每年扫除2000万人左右。<sup>[27](p.1019)</sup>为确保青壮年在扫盲之后能够有持续受教育的机会,教育部探索完善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业余教育体系,帮助工农在完成工作之余,能够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有所提高。<sup>[27](p.943)</sup>为进一步强调业余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的价值,1960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业余教育委员会,负责几亿青年和成年劳动人民通过业余教育提升自身政治、技术、文化水

平。<sup>[24](p.14)</sup>在尚不具备发展体制教育的农村地区,也采取了业余教育的思路,通过兴办简易小学和农村中学,弹性办学,灵活授课,将教育与农村实际生产相结合,使农村学龄人口尽可能接受基础教育。<sup>[34](pp.98-99)</sup>

另一方面,教育改革要打破教育资源过于集中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对干部子弟学校的处理上。1952年6月,北京市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了中小学生的经济负担和生活情况。报告指出,普通中小学学生的伙食营养状况不尽如人意,学生不同程度上患有因营养供给不足而导致的疾病。与之相比,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却享有伙食费和津贴费,干部子弟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还根据家长的级别高低予以不同程度的公费补助。报告直言,这种资源明显倾斜的现象“影响极坏,应该改变”。<sup>[28](p.653)</sup>毛泽东阅读了北京市委的报告,并了解了干部子弟学校的运转情况后,对这一问题作出批示,认为第一步应该统一待遇,不再分等级;第二步要“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sup>[35](p.564)</sup>

毛泽东将干部子弟学校贴上“贵族学校”的标签,可谓态度明确。事实上,干部子弟学校除了生活待遇方面之外,还享有其他资源优势。比如,干部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加优秀,教师往往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育经费投入也远远高于普通学校。根据北京市的调查发现,办一个干部子弟学校所需经费往往达到普通学校的数倍、十几倍,差距非常大。尽管占据各种资源,但干部子弟的教育效果令人担忧。学生被精心呵护,完全与社会脱节;没有公共意识,浪费物资严重;不尊重老师,目中无人。一言以蔽之,特权思想已经开始萌生。<sup>[36]</sup>干部子弟学校的存在,不仅抢占了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滋长了身份等级意识的蔓延,与实现教育公平的新理想不相符,更与社会主义旨在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背道而驰。1955年10月,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指出从1956年起,地方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转变为普通学校,交由地方管理。<sup>[37](pp.548-549)</sup>中央取缔干

部子弟学校的态度坚决,但由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取缔过程持续数年,不过整体上还是实现了干部子弟与普通子弟共同就学的目标,打破了特权的封闭循环圈。

毛泽东关于社会关系改造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回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关系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人民立场。通过社会关系改造,新中国的生产发展也获得持续性动力,实现了跨越式进步。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表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能只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兼顾社会关系改造。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力发展,失去相应约束,就容易走向人民立场的反面,丧失社会主义价值关怀。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徐俊忠.关于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兼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J].开放时代,202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江宇.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70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1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2]王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3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13]苏渭昌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10—1966.5)(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8]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徐俊忠.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毛泽东农治思想与实践探索再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1).  
 [21]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3]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6]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27]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8]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档案馆编研处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中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30]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档案馆编研处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上册)[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  
 [3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2]张放.毛泽东锻造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12).  
 [33]张放.追求教育平等的尝试:小学新学制改革及其影响(1950—1953)[J].中共党史研究,2015,(9).  
 [3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6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6]张放.中共干部子弟小学历史初探[J].史林,2016,(2).  
 [3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图 图

**The Experience of Localized Governance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Its Inspir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PC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e localized governance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provides useful inspiration for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provid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asing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o consolidate the 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and fully mobilizing the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promoting equity and justice to provide value indicators for the modernization; enhancing cadres'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ability to provide team support; and centering on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provide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Wang Dong-wei and Dong Yang)

**On the CPC's Leading Social Change with Mainstream Marxist Discourse:** In its century-long history, the CPC has always unwaveringly adhered to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Every victory achieved by the Party in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constantly realize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discourse with Chinese social practic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PC has kept pac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ontinually realiz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discourse, and successively constructed the dis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rming the discourse genealogy of Chinese Marxism. Upon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leading social change with mainstream Marxist discours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not only highlights its considerabl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 provide realistic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profoundly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discourse changes.(Xu Li-bo)

**Mao Ze-dong's Epistemological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PC:** Recognizing the revolutionary object is the primary issue of revolution, which not only determines the task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ut also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rty, Mao Ze-dong's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the objec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Chinese communists of the same period, demonstrated an epistemological understanding with dramatic differences: Mao Ze-dong revealed the reasons for opposing imp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national crimes, unearthed the basis for opposing feudalism from the level of social roots, and clarified the reasons for opposing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with the method of class distinction. Clarifying Mao's epistemological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ll not only help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e the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also help to fully grasp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ization of Marxism.(Lin Zhi-you)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Mao Ze-dong,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follows a socialist direction and reflects socialist values lies in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Mao's specific thinking on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core issues: first, how to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oothly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of ownership, and eliminate urban-rural, occupational, and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s; second, how to maintain socialist ideals and communist beliefs and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rd, how to practice people's democracy, liberate people from the oppressive structure, and eliminate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The reform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relations that bega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around the 1960s, have been closely focused on these three core issues and have made achievement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providing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spiritual wealth for further deepening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the socialist road in the future.(Zhang Fang)

**Frequently Re-Reading and Re-Reflecting on Mao Ze-dong's Writings for New Understanding: Summaries and Reflections up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Quotation of Mao's Writings:** Rich in meaning and directional guidance, many quota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in Xi Jin-ping's speeches and writings are worthy of our constant comprehensio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e quotations from Mao's writings in Xi Jin-ping's speeches and writings have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quent quotation, long time span and wide content coverage; these contents, centering on four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spiritual bloodline, the "living soul", the "Three Great Treasures", methods of thought and work, guide the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all aspects; three insights can be drawn from them: they observe the correct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omrade Mao Ze-dong's historical status and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new era; they manifest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Chinese Marxism that is consistent and advances with the times; and they refle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Mao Ze-dong's discourse on the CPC's discourse system. We should frequently re-read and re-reflect on Mao's writings for new understanding, as history can reflect reality and look far into the future.(Li Yu-me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